

李 强 著

和而不同的文人世界：

北宋庆历时期的士风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 强 著

和而不同的文人世界：

北宋庆历时期的士风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而不同的文人世界:北宋庆历时期的士风与文学/李强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61 - 3337 - 8

I. ①和…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北宋
IV. ①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68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许继起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倩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三环西路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h.com>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49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文已堪想《通鑑》與其《早世學術巨擘文哲新探》相繼出，《”表圖文珠劍——異曲同文王袁叔《藝林錄》》深得過譽宋元一脉而領國本學術勝選者獨學宋平情中了取朴，皆善特大《家志詩一脉志士學脉啟發》、《志士學脉翰入文化開拓》成，前赴齊楚而宣或并，齊文者不遺从，更顯已矣學脈風流矣。武清志《張景炎會舟升古國中社學案》等，著《風土的開拓者宋人之詩》博雅泰，《志士學人風采管慨》既出遠未平直，深而學文已風土迅夫宋江既有具，負吾而大野即叶本保平于斯《子所居而立》十弃我主求聖者，果为深得而著骨本學要重存心不固中守志哉”。此外《風土的開拓者宋人之詩》文辭醇厚博雅深。

一 研究概况

北宋是中国古代社会近世转型的关键时期，北宋士风在仁宗庆历年间达到一个高潮，庆历士人“和而不同”的政治文化理念对后世的政治与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构建。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王国维、章太炎等著名学者对宋代文化和文学做出过高度评价，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在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文史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以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领衔的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自2000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对宋代文学研究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古典文学渐渐突破以往的研究模式，王水照先生曾将近年宋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文学与科举”、“文学与地域”、“文学与党争”、“文学与传播”、“文学与家族”五个重要的新兴交叉类课题，戏称为“五朵金花”。文人群体研究和文学、政治、文化之间的整合研究，以及对文人的心理心态研究、转型期思想研究等，逐渐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热点，产生一系列重要成果。论著方面有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肖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张兴武《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陈元峰《北宋馆阁翰苑与诗坛研究》、熊海英《北宋文人集会与诗歌》、冯志宏《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等，获得学术界较高评价。复旦大学新近出版《复旦宋代文学研究书系》，包括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金甫曜《苏轼“和陶诗”考论——兼及韩国“和

陶诗”》、陈湘琳《欧阳修的文学与情感世界》、成玮《制度、思想与文学的互动——北宋前期诗坛研究》、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六种著作，体现了中青年宋学研究者最新的学术创获。论文方面也多有佳作，如张海鸥《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徐远和《宋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观》、欧海龙《灵魂的悸动与嬗变：从唐宋诗之别看宋初士人文化心态》、秦寰明《试论北宋仁宗朝前期的士风》等，都给本书以很大的启发。具体到北宋庆历士风与文学研究，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洪本健先生发表于《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上的论文《庆历新政人士和北宋散文的发展》认为：“发生在中国11世纪40年代的庆历革新，虽然只历经短暂的岁月即告夭折，但它给弊政丛生的北宋朝廷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震荡，也对北宋散文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政治变革的夭折，并没有使文坛沉寂，反而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丰收”。马茂军先生近年来致力于北宋士风与文学研究，成果颇丰，其新著《宋代散文史论》中专辟《庆历党议与庆历散文》一节，通过探讨庆历党议的三个中心议题，呈现庆历散文的议政主题，并从“议政精神”、“纤徐委曲文风的形成”、“六一风神的形成”三个方面探讨了庆历党议与欧阳修的散文成就。关于“太学体”的研究也是庆历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曾枣庄先生《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葛晓音先生《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太学体”研究的两篇开山之作，祝尚书先生《北宋“太学体”新论》、朱刚先生《“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张兴武先生《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等一系列专论，进一步将“太学体”研究推向深入。海外的宋代文学研究也成绩斐然，王水照先生主编的两套《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体现了近年来海外宋学研究的新成果。随着中外学者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宋代文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宽。有的著作虽然并非专门研究宋代，但其研究思路和有关见解，为本书写作提供了不少启示和帮助。

二、几个关键词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十分重视具体政治、文学事件的考证，重视“时、地、事、人”的综合研究，在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上，

也多体现着笔者自己的学术思考。因此，在进行本课题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课题中涉及的“庆历时期”、“士风”和“文学”等关键词进行概念上的限定。

首先是“庆历时期”这一概念。“庆历时期”与“庆历之际”比较接近，都是指以仁宗朝庆历年间的政治革新为中心，上下各延展一、二十年的时间段。相对而言，“庆历之际”所涵盖的历史范围或许更广一些。而以“庆历”为年号的七八年（1041—1048），则被包括在本书研究框架中的“庆历中期”之内。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自刘太后执政后期开始，社会上逐渐开始涌动革新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宋夏战争失利这样的外力作用下，最终引发了庆历年间的范仲淹领导的政治革新。政治革新失败后，北宋的政治和士风又有了新的变化，这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史发展单元，有必要做单项专题研究。本书在大量历史资料中探寻能呈现这些变化的标志性政治文化事件，在此基础上研究不同时期的文人生存状态和文学发展状况。为此，本书将庆历时期划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笔者尝试用微观与中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期更立体地呈现庆历时期的士风和文学。

“士风”，一般是指特定时代士人群体的普遍行事方式、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等。“士人”并不等同于“文人”，“文人”本有广、狭二义，狭义指我们所认同的创作了大量流传于世的文学作品之人，在宋代，他们大部分在“士”的范围内，但也有一些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如北宋前期的“九僧体”诗人，把他们算作“士”的范围则有些牵强。而对那些与政治关联不大，在思想史或文学史上没有发出更重要声音的“文人”，笔者并不把他们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广义的“文人”，在宋代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是指与“武人”相对应的另一社会政治群体，这倒与本文研究对象“士”非常接近了。在具体的论述中，笔者有时会使用“文人”一词，并不是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笔者所指的是与“士”内涵相接近的广义的“文人”。

“文学”包含内容十分广泛，按照对古代文学最基本的认识，至少可分诗、词、文三个方面。本课题重在探索在一定的士风嬗变背景下，文学的发展演变情况，而具体研究士风对某一特定文体的影响，目前还不具备

相应的研究条件。如果以整个北宋为考察对象，虽然各体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取向并不一定存于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但是文学之嬗变轨迹还是隐隐可现的。笔者只是从发展的角度去研究文学，而不去做全面的文学演变史考察。在研究对象方面，本书更关注特定时期内文人群体构成与文人活动情况，以及诗文革新视野下的诗歌和散文发展。由于宋词在北宋前期的发展状况自成体系，学界也有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因此本书对庆历词坛的状况没有进行专题研究，虽然这也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课题。

三 本书章节安排

本书共分五章，从结构上看，第一章、第二章是士风方面的研究，同时也是庆历文学发生背景的研究。笔者根据前期研究成果，将庆历文学划分为“庆历前期”、“庆历中期”和“庆历后期”三个发展时期，本书第三章到第五章即分别研讨这三个时期的文人和文学发展状况。

第一章“庆历文人的历史世界与现实政治”，重在解决两件事情，其一是从宋初到庆历前北宋士风的发展脉络。古代文学研究往往容易忽略“时、地、事、人”的综合研究，文学发生背景被抽象化。为解决此问题，本书从庆历前的70余年宋史中撷取“易代之际的文风”和柳开两个研究样本，旨在呈现出北宋文学与文人心灵发展史的关联性。其二是庆历士人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庆历新政”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庆历士人在革新中表现出来的以名节相尚、“和而不同”的精神风貌，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一笔重要的财富。

第二章“政治文化事件与庆历士风嬗变”，关注的是庆历士风问题。本章以“《庆历圣德诗》事件”、“争水洛城事”和“滕子京事件”，以及“进奏院狱”为研究对象，勾勒出庆历士风从高潮到裂变的大体发展脉络，旨在探寻君主专制下士风嬗变的内在理路。庆历士人群体的优秀代表，在庆历时期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活力与生机，缔造了文人政治伦理的新典范，虽然这种新典范很快被专制体制固有的政治惰性所消解，但是其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优秀思想资源，在中国文人心态史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庆历前期士风与文学”。如果没有天圣、明道年间洛阳才俊

的文学探索与实践，整个“庆历文学”则无从谈起，庆历前期的文学活动为庆历中期的文学呈现做了重要准备，其核心成员在庆历后期的文坛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章对洛阳文坛主盟人钱惟演及其助手谢绛做了重点研究，关注了庆历前期主要文人的文学活动情况。欧阳修与西昆体的关系是个经常被研究者提起的话题，本章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昆文风和庆历文风之间发展脉络的新视角。

第四章“庆历中期士风与文学”。庆历中期的文学伴随着庆历新政而展开，但从时间范围来看，要超出“庆历新政”具体实施的时间，实际包括新政实施前的酝酿期和新政失败后的影响期。为此本章选取了典型文人、特殊文学现象和经典文学作品分析三个研究点，从三个侧面描绘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本章选取的个案研究对象是《醉翁亭记》，探讨此文与北宋散文革新、宋元文章理论和其他文学现象之间的关系，从散文批评的角度勾勒出当时的文学生态，探讨“庆历新政”时期优秀文学作品的文学史价值。

第五章“庆历后期士风与文学”。经历了“庆历新政”时期的政治风波，庆历士风已发生嬗变，苏洵、王安石、刘敞等庆历后期士人开始在文坛崛起。庆历后期文坛最大的特点是群体性文学活动增多，此期欧阳修虽然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突出的成就，但作为文坛主盟人，他热情地组织文学活动、发现文学新人、倡导新的文学风尚，对宋代文学发展居功甚伟。本章选取刘敞做个案研究，通过对其官风、士风和文风的分析，了解庆历后期士人与文学。本章最后通过对欧阳修书简的研究，勾勒出整个庆历时期精英文人间的网络化生存实相。

本书余论部分，笔者尝试从散文革新的角度，粗略勾勒出庆历前后散文的发展、演变图景。本书名为《和而不同的文人世界——北宋庆历时期的士风与文学》，但着力点在庆历文人与文学，“士风”嬗变只是“庆历文学”发展与演变的众多文化背景之一，还远远不是全部，这也是笔者在此要特别说明的。

(80)	经典人文与撰文觅真迹·总跋	第二章
(81)	同人序·耶鲁的倒人文像前往德国想人	第三章
目 录		
(82)	宋一函文道模印瓦文板·余	第一章
(83)	秦简秦印字百国天宋北·惠	第二章
(84)	楚文李秦墓主	第三章
(85)	吕后	第四章
前言	(1)
第一章 庆历文人的历史世界与现实政治	(1)
第一节 易代之际的文风	(2)
第二节 柳开与北宋士风重建	(14)
第三节 庆历时期的北宋政治	(27)
第二章 政治文化事件与庆历士风嬗变	(36)
第一节 《庆历圣德诗》与庆历士风	(37)
第二节 庆历士风的高潮与裂变	(45)
第三节 “进奏院狱”与庆历士风	(54)
第三章 庆历前期士风与文学	(64)
第一节 钱惟演与庆历前期文坛	(64)
第二节 谢绛及其文学创作	(77)
第三节 庆历前期文人及其文化担当意识	(91)
第四章 庆历中期士风与文学	(107)
第一节 庆历中期文人述要	(107)
第二节 “太学体”:庆历文学被忽视的角落	(123)
第三节 《醉翁亭记》:庆历中期散文的典范之作	(134)
第五章 庆历后期士风与文学	(149)
第一节 欧阳修与庆历后期文坛	(150)

第二节 刘敞：庆历后期的文人典型	(169)
第三节 从欧阳修书简看文人间的沟通与认同	(186)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203)
附录 北宋开国百年时事简表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6)
(1)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言前
(1)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第一章
(2)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第二章
(3)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第三章
(4)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第四章
(5)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第五章
(6)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变故风土记与已背秦卦文告诫
(7)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风土记与“晋惠帝乱史”
(8)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变故风土记与晋惠帝
(9)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风土记与“姚泓秦直”
(10)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华文已风土记与前浪史
(11)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本文照面见史与晋惠帝
(12)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晋惠帝文具及秦直
(13)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谢惠连与孙权及其人文儒道思想
(14)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华文已风土记中浪史
(15)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罗生人文浪史
(16)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晋惠帝与孙权，“本学术”
(17)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晋惠帝与孙权，《五等爵制》
(18)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华文已风土记与浪史
(19) 余论 对庆历时期散文的一点思考	赵文祥与孙权与晋惠帝

富而进必当向求高处人文朝最正豪盛，朝同君人所畏自干固人土故不懦弱
诗篇，自感至曾亲而想他因未云登景国惠惠的帝如道言宋非。章堂——前
象公卿贵由学文已风士歌由田人歌博爱良工成，下歌者折公歌者文歌
，察等山川殊物之文。

第一章 庆历文人的历史世界与现实政治

风文史研究文集 第一卷

庆历，是北宋第四任皇帝仁宗在位期间所用的第六个年号，具体时间在公元 1041—1048 年。^①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庆历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也为了论述上的方便，笔者对庆历前后的北宋历史分期做了简单的界定，把从宋朝肇建到宋仁宗亲政前的七十多年时间，看作北宋前期（960—1033 年）；从仁宗亲政一直到宋神宗去世，这五十多年称为北宋中期（1033—1085 年）；宋哲宗即位直至北宋灭亡，看作北宋后期。北宋前期的主题是稳定政权，在此基础上进行文化与思想世界重建。北宋中期的主旋律是改革，既有政治上的改革，也有文学文化领域内的革新，此期是北宋最充满活力的时期。北宋晚期充斥着文人党争，北宋也最终走向灭亡。此乃北宋政治文化之大略，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时段就在北宋前期和中期相交接的二、三十年，这正是以庆历为中心前后各延展一、二十年的时间范围。庆历时期是北宋文人政治发展的极致，对庆历大臣们的政风，后人也是津津乐道，“宰相肚里好撑船，虽是俗谚，实有至理。肚内撑不得船，不免窄狭局促，何能平章天下？韩、范、富、欧四君子，上殿相争如虎，下殿不失和气，都缘他有大学识，胸次宽广，故赞成仁宗庆历之治。”^②“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时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已也”^③。庆历士风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但是君主专制

^① 为了叙述方便，本书通常采用年号纪年，不一一换算成公元纪年。书后附有“北宋开国百年时事简表”，可备检索。

^② 《见闻杂记》卷一。

^③ 《贤奕编》卷二。

体制下的士人囿于自身的人格局限，最终还是使文人政治走向它必然的宿命——党争。北宋官僚政治的理想图景经过庆历时期的短暂呈现后，就和现实逐渐分道扬镳了。为了更透彻地了解庆历时期士风与文学的发展线索和历史地位，我们有必要对庆历时期前的北宋士风与文学做粗略的考察，同时对庆历年间的政文化背景做更深入的探究。

第一节 易代之际的文风

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近世转型的重要时期。^①一直以来，学界对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文学的整体评价并不高，如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1996年版《中国文学史》认为“北宋统一以后，在文化包括文学方面，并没有立即带来显著的变化”，“唯一例外并引人注目的是，自晚唐五代以来几乎已经中断了的古文运动在北宋初期就开始复兴”^②。孙望、常国武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史》对宋初文学的评价也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宋朝建国后，基本上沿袭了五代余绪，由五代入宋的作家如徐铉、宋白等人，文风大都趋于绮丽……柳开、王禹偁的发难，揭开了宋初古文运动的序幕，但未能引起普遍持久的社会反响。”^③张毅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研究（上）》也认为“在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中，对北宋初期文学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长期以来缺乏专论；除柳开、王禹偁、杨亿和晏殊有各类文学史著作提及外，其他作家就鲜为人知了。”^④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渐呈繁荣之势，但关于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大都未超出上述诸先生的论述范围。笔者在研究庆历文人的历史世界时，关注到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文风的特殊性，在研读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尝试对此期文风做一概要描述，以期

^① 笔者此处采用“易代之际”这一研究时间概念，主要指五代末至宋初约三四年的时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宋朝成立后最初一二十年的文人构成，大都有五代仕宦背景，其创作很难以朝代的演替来划分。特别是在宋初政权构成、政文化并不明显区别于五代政权的情形下，更难割裂文学发展脉络。

^②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上）》，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更深入地了解宋代文学的发生背景。

一 语言风格的平易质实

北宋文学最大的成就当属散文，宋代散文最典型的文风特点是平易、流畅，通常我们认为宋文风格之成熟发生在北宋中期的欧苏时代。但如果寻找宋文风格比较切近的源头，考察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文风应为必要之学术工作。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正处于社会由乱及治的变动时期，能够保存下来的散文作品并不多，从文体上来看，主要是一些奏议文字和庙记、亭壁记之类的文章，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语言风格的平易质实。

在后周和宋政权都担任过翰林学士的陶穀，被认为是易代之际中原文坛的一面旗帜，但长期以来，其文学地位被大大低估，这主要缘于宋人对他人品的非议。传说他曾被宋太祖赵匡胤嘲笑为“依样画葫芦”，阅读陶穀写的不少制文，我们发现确实有语义重复、多用陈词的缺点。但他毕竟是当时的大手笔，其四六文用典得体，语意高妙，反映了易代之际骈文的最高水平。他写的一些奇句单行的散体文，文风也质实流畅，如《请禁伐桑枣奏》：

臣闻古者以稼穡为生民之天，机杼乃丰财之本。是以金根在御，王者用三推之仪；鞠衣载陈，后妃有躬桑之礼。则知自天子至于庶人，不可斯须忽于农桑也。又司马迁著书曰：“齐鲁之间千亩桑，安邑千树枣，其人与千户侯等。”伏见近年来，所在百姓，皆伐桑为柴，忘终岁之远图，趋一日之小利。既所司不禁，乃积习生常。苟桑柘渐稀，则缯帛须阙，三数年内，国用必亏。虽设法课人种桑，且无及也。旧木已伐，新木未成，不知丝绵欲凭何出？若以下民方困，不可禁之，倘砍伐一空，所在如是，岁或不稔，衣食尽忘，饥冻逼身，须为群盗。图难于易，哲王令猷；作事谋始，有国常务。乞留眷览，询访辅臣。欲望特下明敕，此后不得以桑枣为柴，官场亦不许受纳，州县城门不令放入，及不得囊私置卖，犯者请加重罪。^①

^① 《全宋文》卷一一。

文章虽然简短，但是语意极其明白晓畅。笔者在阅读此类文章中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即这种平易流畅的文风，在上行的章奏之文中比较流行，表明此种文风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易代之际名臣张昭的奏议之文也有文风浅易、用语质实之特点，他的奏议虽然带有不少骈文的痕迹，但是并不注重用典，文风取向平易，重在文章的表达效果。他常在文中引用一些前代名言，如其《请妙选东宫师傅疏》，文风浅易，应用故实，重在说理，条分缕析，很讲究说服艺术，全文有一种极强的逻辑力量。在具体引用上，作者也充分注意到读者阅读能力，多用一些常见的典故或俗语。如《谏畋猎疏》虽然隐约具有四六文的架构，但是文风却全然不类，在提到帝王“为法之弊”的时候，他引用了“城中好广眉，城外加半额”的典故，这在当时几同于俗语；在《请尊师傅讲论经义疏》中，他引用“江海不辞细流，所以成其大；山岳不让撮土，所以成其高”，取譬也是十分浅易，这样浅易的熟典很少出现在北宋优秀散文中。考察张昭入宋后的文章，如《重集三礼图议》、《请奉宣祖配享议》和《请行夜警晨严之制奏》等，基本上也以流畅的散体文为主，语言风格更趋平淡、圆润。

易代之际文章的质实之风，不宜看作宋初文人文化积累的匮乏或文学手段的不足，他们并非不能创作精美典雅的文章，其文中体现的这种平易流畅，当出自文风上的主动追求。这种多出现在上行公文中的语言风格与官方的导向有关，如宋太祖在乾德四年曾发布了一份《进策不得乱引闲词诏》，这大概是北宋第一份整顿文风的官方文件：

今后应诸色进策人，并须事关利害，情绝虚浮，益国便民，言直事当者，方可为策，即不得乱引闲词。其所选事条，仍不得过五件以上；如是已经晓示不行者，亦不得再有投进。宜令匦院候有进策人，分明晓示，先取知委文状，及通指安下处所，方得投匦；如有违越，并当劾断。如是本官官吏不切晓告，当行朝典。其余申冤论事，不在此限，亦不得腾越，须曾经本处论诉，不与施行、有偏曲者，方得投匦。^①

^① 《全宋文》卷四。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命令，放眼中国文学发展史，此类事件并不罕见，但以往多从文体改革着眼，强行推行所谓的古体文，而宋太祖这篇诏令强调的是文风改革，并没有对文章体制做出强制要求。文件下达时虽然已经建宋七年了，但一方面说明宋太祖此期的阅读取向依然带有明显的五代统治者的喜好风格，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晚唐华丽文风还有一定的流行趋势。无论这种趋势为晚唐五代固有之风，还是新宋王朝逐步兴起的文学潮流，都已不适应易代之际特殊的政治文化需求，难免被淘汰的命运。而平易质实的文风，也是五代文学遗产的一部分，更适应易代之际的社会需要，因此获得了相对长久的生命力。直到太宗、真宗朝，南方文化逐渐大规模地融入中原地区固有文化，西昆文风渐成宋朝主流文风，这种易代之际的平易质实文风才退出文学主流地位。

二 文章体制的雍容典雅

从文章体制而言，易代之际的下行公文和一些碑版文字多表现出雍容典雅的风格。宋初文臣大都在五代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属于当时的文化精英群体，即使在文人地位普遍降低、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这一批文人依然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源，担负着延续中原文化之血统的功能。陶穀之文，虽然曾被宋太祖嘲笑为“依样画葫芦”，但实际上这里也透露出一个关于文章体制的信息。某种文章体制的固定化，是古代文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表征，体现了作者和读者双方对某一种文学样式的特殊阅读期待。五代末至宋初易代之际对典雅文风的追求，也是我们考察宋初文学发生土壤的重要视角。

我们先来看陶穀替周世宗写给陈搏的一篇敕文。周世宗在显德三年（956）会见了著名隐士陈搏。陈搏早年亦有济世之心，周世宗又号为五代第一明君，陈搏对二人的会面抱有更多期望。但遗憾的是周世宗只是向陈搏咨询了神仙之术，这让陈搏大失所望，二人的沟通并不顺畅。最终陈搏拒绝了周世宗的挽留，执意归山。周世宗让陶穀写了这篇敕文：

朕以汝高谢人寰，栖心物外，养太浩自然之气，应少微处士之星，既不屈于王侯，遂高隐于岩壑，乐我中和之化，庆乎下武之期，

而能远涉山涂，暂来城阙，浃旬延遇，弘益居多。白云暂驻于帝乡，好爵难縻于达士。昔唐尧之至圣，有巢、许为外臣，朕虽寡薄，庶遵前鉴。恐山中所阙，已令华州刺史每事供须。乍反故山，履兹春序，缅怀高尚，当适所宜。故兹抚问，想宜知悉。^①

这篇庙堂之文受体制所限，字数虽然不多，但典雅得体，意蕴丰富，前面六个小句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给受文对象以高度评价，属对工整，用典贴切。接下来六句追述了陈搏赶来相见的情况，明褒对方，实际上也自留余地。然后再用六句对陈搏拒绝朝廷爵位的行为进行评论，表达出周世宗对此事的态度。第四层次加进两个句子，看来似乎与整体风格不类，甚至体现出作者笔力的不济，但实际上作者在这里笔势陡转，由虚入实，既为全文作结，又遵从此类文章的一般体制，虽然可能属于“依样画葫芦”的部分，但全文看来，结构安排精当典雅，用语也十分得体，体现了作者的匠心和文化底蕴。传为陈搏所作的《谢手诏并赐茶药表》风格与这篇文章非常类似：

丁宁温诏，尽一札之细书；曲轸天资，赐万金之良药。仰佩圣慈，俯躬增感。臣明时闲客，唐室书生。尧道昌而优容许由，汉世盛而任从四皓。嘉遯之士，何代无之？再念臣性同猿鹤，心若土灰，不晓仁义之浅深，安知礼仪之去就？败荷作服，脱箨为冠，体有青毛，足无草履。苟临轩陛，贻笑圣明。愿违天听，得隐此山。圣世优贤，不让前古。数行紫诏，徒烦彩凤衔来；一片闲心，却被白云留住。渴饮溪头之水，饱吟松下之风，咏嘲风月之清，笑傲云霞之表。遂性所乐，得意何言。精神高于物外，肌体浮乎云烟。虽潜至道之根，第尽陶成之域。臣敢仰期睿眷，俯顺愚衷，谨此以闻。^②

这是篇极富诗意的散文，虽然也使用了当时公文流行的四六体制，但

^① 《全宋文》卷一一。

^② 《全宋文》卷一〇。这篇文章虽说来源可疑，但没有确切材料证明其必伪，笔者姑且采信其出于陈搏之手的说法。即使为宋人假托，或许也反映了作者对彼时文风的体认与把握。

此文文脉流畅，语意悠远，结构安排上也舒卷有致、层次分明，给人以极强的阅读美感。

宋易代之际的碑版文字，也体现了雍容典雅之风。阎光度写于乾德五年的《重修应圣公庙记》，是此类文章的典型：

昔隋氏末季，唐祚未兴，四海黎民，墮诸涂炭，万方豪杰，各举戈矛；驱虎兕以鵠张，统貔貅而蚕食。载血腥原野，暴骨成丘山。时无定君，人思真主。唐高祖执义为柄，唱义成师，啸集群雄，肃清天下，吊问乱世，起救寰中。师次吕州，前有勍敌，攻则力寡，战则兵羸，飞挽距前，水潦为患，疑虑不决，人心复摇。是时也，霍岳之神，幽贊而起，荡清逋役，引导王师，破宋老生霍邑县。临汾既拔，绛郡寻平。埽扫欃枪，席卷氛祲。擒窦建德，降王世充。大风起而云物骆除，太阳出而露华冰铄。君临大宝，神有力焉。论曰：天拨乱而启圣功，神献奇而扶唐祚，所以角力杰出者为唐之藉，蜂屯蚁聚者为唐之资。而后立庙庭，备洒扫。天寶中，伸祀典，行册命，四渎齿诸侯之秩，五岳符三公之位。冀州镇霍山神封为应圣公，盖显幽贊，答灵贶也。“西方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①，即此山也。郦善长《水经》云：霍太山其庙，“鸟雀不栖其林，猛兽常守其庭”，即此庙也。设险负固，排空耸高。东会太行，西偶姑射。扼夷护夏，却敌藩边，不可议也。吐翠含芳，罗植万类，出云泄雨，沛润百谷。即春秋以生杀，同天地之长养，不可穷也。戎师天水赵公节制是邦，于今八载。衽金钺，按碉戈，登将坛，分戎阃。下车而民悦，考绩而政成。敌不侵边，人皆勤业。乡闾丰亨，地方肃静，盗贼屏息。以义安都维那鱼璋等，广化群心，复构新殿，侔诸大壮，焕乎成功。云攢蟠蛟之梁，似生岩嶂；鱼贯碧烟之瓦，诞下汀洲。复严如在之容，永享惟馨之

^① 《全宋文》原文如此，甚不通顺。据《山西通志》卷二一所载此文，为“书：‘昆之美，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或可通。此句常见，都提到引自《尔雅》，其原文为：“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此书为常见之书，以理校之，阎光度原文当为：“《书》：‘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